

Comrade Mao Zedong's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extension of the logic of "two combinations": an examination centered on "On Contradiction"

Huanyi Xu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wo combinations" contain the logic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s, as well a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requir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Comrade Mao Zedong's many statements in "On Contradic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They not only effectively criticize the erroneous tendencies of dogmatism, but als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localized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which is an early model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omrade Mao Zedong further applied the "two combinations" methodology in "On Contradi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ist society and demonstrating strong practical vitality.

Keywords

"combination of two"; Mao Zedong Thought; On Contradiction; marxism in china

毛泽东同志对“两个结合”逻辑的运用及其实践延展——以《矛盾论》为中心的考察

徐焕易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两个结合”中蕴含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逻辑,要求达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诸多论述都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契合,既有力地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又推动了本土化革命策略的形成,是“两个结合”的早期范本。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一步运用了《矛盾论》中的“两个结合”方法论,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处理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彰显出强大的实践生命力。

关键词

“两个结合”; 毛泽东思想; 《矛盾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的时代命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深度契合,既破解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桎梏,又为“两个结合”的理论构建提供基石,对于理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徐焕易(2005-),男,中国浙江人,本科,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 《矛盾论》的理论总纲: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两个结合”命题中蕴含着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普遍性真理,为中国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特殊性维度,既承载着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又蕴含着中国话语的文化基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土壤。进而,“两个结合”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在中国的实践中得以具象化,中国实践经验又需在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得到进一步升华。

《矛盾论》发时代先声,可谓“两个结合”的早期范本。一方面,毛泽东同志以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为理论

精髓，结合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批判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范本”^[2]；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调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累，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学典故中的矛盾观和辩证法进一步论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扎根中国大地，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底色。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3]在《矛盾论》中，他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矛盾观和辩证法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转化为中国化的实践语言，就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展开大篇幅地论证。

他从中国古代军事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入手，启发同志们需要对矛盾双方的情况有全面透彻的把握；结合魏徵的政治智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批评党内部分同志看待问题的主观片面性。文学名著也是毛泽东同志用来阐释矛盾分析方法的重要工具，他以《水浒传》“三打祝家庄”的叙事为载体，指出调查研究特殊情形以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宋江前两次失败源于对祝家庄地形、联盟关系等特殊情形的忽视；第三次胜利则通过实地调查、分化联盟、伏兵奇袭等方式实现。在分析矛盾时，不仅需要从事物间的整体关联性中进行考量，还必须细致地调查和分析每个阶段内部矛盾的各个具体方面，发现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互相联结，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然而，中国古代辩证法具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二重性，“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4]，并且重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对矛盾的特殊性仅是粗略的提及。毛泽东同志摒弃了古代辩证法中的唯心论与形而上学成分，结合唯物辩证法对古代辩证法中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化。辩证扬弃中国古代辩证法的过程，实质上是“以马化中”与“以中化马”的双向互动，既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克服古代辩证法的朴素性，又以传统文化的本土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为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树立了典范。

3 《矛盾论》的动力机制：内因和外因的协同作用

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特殊性因子，始终受到内部矛盾（即内因）和外部矛盾（即外因）的双重影响。在“两个结合”的视域下，内因既包括中国各方面的社会矛盾，又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话语表达；外因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提供理论工具为激活中国社会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张力赋能，引领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持续发挥中国智慧，探索并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同时，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又反作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助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范式的形成。

《矛盾论》通过揭示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强调内

因和外因的协同对于事物运动与发展的重要性，批判了忽视内因根本性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为理解中国革命提供更全面的视角。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内因和外因的协同作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机制，更为“两个结合”确立了“以内因为本、以外因为用”的实践原则。

中国古代哲学虽未直接使用“内因”“外因”的概念，但其对矛盾运动规律的认知与“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辩证关系高度契合。

道家思想认为万物依循内部矛盾性的规律运行和演化，重视内因的主体性，强调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成功源于庖丁本人精湛的技艺与对解剖规律的深刻理解，将刀刃的运用与筋骨结构的特性等外部因素转化为“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实践智慧，而非单纯依赖外部工具的机械化操作。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也隐含着对个人内在修养与外在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修身”是起点，强调个体内在道德修养与认知能力的提升；“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外化实践，需通过家庭关系、社会治理等外部条件实现。儒家同时指出“内圣外王”的统一性，如果自身有修养的缺陷，那么齐家治国必陷于混乱。

毛泽东同志汲取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对于内外因辩证关系的阐述，并通俗易懂地用中国话语进行表达。他通过“鸡蛋与石头”的事例，说明外因温度能使鸡蛋孵化为鸡子，却无法使石头发生质变，根本原因在于鸡蛋内部蕴含生命，而石头缺乏这一内在根据，形象地阐释“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5]针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引用苏轼《范增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6]的论断，通过“腐”与“虫”的辩证关系表明，祸患的产生是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而导致外部势力乘隙而入，正如国民党外部围剿的成功源自于党内指挥的失误。

这种内外因的互动逻辑，在中国古代兵家思想中早有深刻体现。兵家所言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本质就是通过全面分析内外条件，制定克敌制胜的策略。毛泽东将这一思想创造性转化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长征途中，他既立足红军士气、根据地群众基础等内因优势，又巧妙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地形险阻等条件，通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战役，将被动转移转化为主动机动的战略布局。这种“以内御外、以外促内”的实践智慧，不仅是对传统兵法的升华，更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典范。

4 《矛盾论》的逻辑延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范式

毛泽东同志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继续延展着《矛盾论》中蕴含的早期“两个

结合”思想。一方面，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的国情和主要矛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处理新阶段下涌现出来的矛盾；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和处理这两类不同的矛盾。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1]，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性质上呈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激烈对抗，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局部调整需求。社会主义社会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它仍然不完善，存在资源配置效率僵化等问题，呈现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性质上，更表现在解决路径的革新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无需通过旧社会的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暴力解决矛盾，依托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能力即可实现矛盾的渐进调和。例如，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暴露的经营管理问题，党中央通过《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调整分配制度，既维护了集体化方向，又引入“三包一奖”责任制，既遵循了矛盾普遍性要求的变革必然性，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的非对抗性化解。

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矛盾也有不同之处，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由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与苏联相比，中国面临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等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呈现多重挑战。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不能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模式，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共八大根据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力发展落后等基本国情，科学判断国内主要矛盾，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

的同时协调轻工业和农业的推进，既遵循工业化普遍规律，又依托农村合作社整合分散资源，走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路径。

社会主义两类矛盾的处理范式深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礼之用，和为贵”、“无讼”等理念在基层治理中转化为“枫桥经验”，强调“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通过乡规民约的自治与外部法律规范相结合，依靠人民自身力量将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既遵循“君子和而不同”的智慧，允许多元声音的存在，又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原则，将外部意见转化为思想共识，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矛盾的非对抗性转化，最终在“和”与“不同”的辩证统一中巩固党的团结，彰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矛盾治理中的深度融合。“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平等思想，又吸纳了传统文化中“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的大同理想，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部制度设计与文化交流政策的外部促进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5 结语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运用“两个结合”逻辑阐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内因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其进行了实践延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范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需要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足“两个大局”的战略定位，以内因主导的改革定力与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在破解“卡脖子”难题中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96.
- [2] 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37.
-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1、303、308.
- [4]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107.